

中華文史論叢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 62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第六十二輯

錢 伯 城 主 編
李 國 章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文史論叢.第62輯/錢伯城,李國章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
ISBN 7-5325-2708-5

I. 中... II. ①錢...②李... III. 文史-中國-叢刊
IV. 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8367 號

中華文史論叢

第六十二輯

錢伯城 主編
李國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2708-5

Z·352 定價: 15.00 元

目 錄

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	王晴佳(1)
論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轉型·····	李維武(84)

試論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	牛致功(110)
試論唐代後期鹽錢的定額管理·····	吳麗娛(133)
略論唐代官私借貸的不同特點·····	陳明光(174)
晚唐時河北地區的一種吉凶書儀的再 研究·····	趙和平(192)

李、陸《南西廂記》之先後優劣考 ——《也談明傳奇的界定》質疑·····	蔣星煜(209)
陳完和他的戲劇·····	江巨榮(217)
北雜劇“沖末”辨釋·····	解玉峰(233)

從小說發現歷史

——《讀鶯鶯傳》的眼界和思路…………… 蔡鴻生(243)

陳寅恪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桑 兵(257)

肅順之死

——晚清史隨札…………… 王家範(293)

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

王晴佳

中國二十世紀的史學，如同二十世紀的歷史，跌宕起伏，氣象萬千，是漫長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內容格外豐富的一段，因此在其演變過程中，不斷有人對之作一些階段性的總結。比如在四十年代，也即世紀之中的時候，顧頡剛、周谷城和周予同等人都發表了論著，以當事人的身份，總結了中國史學自清末以來的變化。自八十年代以後，以許冠三的《新史學九十年》為開始，又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的著作。值此世紀之末，筆者也不遑淺陋，希圖從史學觀念的變化入手，分析、描述一下中國二十世紀上半期史學的幾次轉折性發展，供內行方家參考、批評。

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的前言中指出：

從新會梁氏朦朧的“歷史科學”和“科學的歷史”觀念起，新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歷來的巨子，莫不以提高歷史學的“科學”質素為職志，儘管“科學化”的內容和準則恒因派別而易，且與時俱變。^①

許冠三在這裡指出了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的基本走向，同時他也注意到了科學史學本身的發展。但是，這一發展究

竟如何，則在書中有點語焉不詳。許冠三比較注意的是史家方法之不同所形成的各種流派，但卻沒有檢討這些流派之間的傳承關係。事實上，他對一些流派的劃分，也顯得有點牽強。如“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料學派”等的區別，就不太明瞭。依筆者所見，這些學派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繼承、演化關係。分析其流變比將之孤立處理，對我們掌握中國史學的變遷，更為重要。

一、科學史學的緣起

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所辦的《新民叢報》上連載的《新史學》各章節，一般被視為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或者可稱之為資產階級史學在中國的開端。^②但是細究起來，梁啟超之提出“新史學”，并非他一人所倡，而是反映了當時許多學者的想法。比如與梁啟超同時的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等以後被稱為“國粹派”的學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甚至，“新史學”這一名稱，也非梁啟超所創，而是當時不少人所同時使用的。從實踐方面來看，梁啟超的貢獻也并不比鄧實、黃節等人重要；後者在《國粹學報》上連載的論著，在當時影響甚大。

這一“新史學”的誕生，基於對傳統史學的反省和批判。這一工作，主要是從康有為開始的，但康的工作，又與清末以來今文經學的興起不無聯繫。如果這是學術發展的內在原因，或“內在理路”（余英時），那末鴉片戰爭前後，開明的思想

家如林則徐、魏源、梁廷枏和徐繼畲等人對外國歷史的研究，則體現為史學發展的外部因素。在“新史學”興起的過程中，內部和外部因素同時起作用，兩者交錯在一起，有時無法分別。如魏源、王韜等人在嘗試當代史，甚至當代西方歷史的寫作時（如魏的《聖武記》與王的《普法戰紀》），他們也在史學觀念的革新上有所突破，其突出的一點是認識到世道之變，反對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說。他們發展了龔自珍的歷史變易論，特別是借用儒學經典詮釋中的“三世說”，提出歷史的變化和螺旋發展。這對康有為和梁啟超以後對中國史學和歷史觀念的改造，都有不少啟發。但是，他們對中國史學之舊傳統，並沒有多少批判之意，只是想“增其新而不變其舊”。換言之，是信奉以後為張之洞所總結的所謂“中體西用”的理論。^③

如果說魏源等人的歷史著述以及他們的歷史變易論，還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歷史觀念的修飾補充，那麼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歷史觀，則是一種歷史觀的革命。自然，康有為的歷史觀念，也披上了傳統的外衣（他本人還故意強調這一點），但究其實質，則無非是借傳統、古代之“酒”，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康與魏源等人最大的不同是，後者雖然也流露出朦朧的歷史進步觀念，但只是一種近乎偶然的表述，而康有為的歷史哲學，則是在接受西方歷史進化論的基礎上，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種反思、改造的結果。^④

康有為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改造，開始於對歷史傳統的懷疑和批判，而他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提倡歷史的進化觀念。康有為的成名作，是他在 1897 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一書。這本書的寫作，如同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帶著一個非

常實用的目的,那就是尋找政治上的賞識者。康有為立志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就無法跟上世界發展的歷史,就會落後。這顯然是歷史進化論思想的一種反映。但是,康有為却硬要“托古改制”,將自己比作當代的孔子。而他的作法,却是用自己的方式解釋孔子,將孔子裝扮成中國第一個大改革家。

康有為解釋孔子的作法,在當時自然引起了不小的爭論,以後也有人對之作了不少討論,在此不必多談。但康為了改造孔子而對中國歷史所作的解釋,則十分重要。康有為指出:

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

這等於是抹煞了當時中國人奉之如神明、賢德無比的“三代”之治,認為是無中生有。而他的根據,則又來自孔子。在康有為的筆下,所謂“三代”的賢明之治,都是孔子的創造。在《孔子改制考》中,他有多處論述。比如他說道:

按三代以上,茫昧無稽,列子所謂“若覺若夢,若存若亡”也。虞夏之文,舍六經無從考信。韓非言:“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託之,以明其改作之義。^⑤

康有為的這一論述,實際上是將中國的古代歷史攔腰切斷,縮短了二千餘年。這在當時,自然是驚世駭俗、有點大逆不道的。通過否定孔子以前的歷史,他不但重新塑造了孔子,而且還重新解釋了中國歷史。康有為的大膽,來自於一種強烈的歷史懷疑主義,而這一懷疑主義,正是科學精神的體現。西方一位科學革命的先哲說過,應當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懷疑一

遍。康有為對中國歷史的懷疑，是科學史學在二十世紀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和前提。因此康有為的疑古思想，對以後的史學家都有不小的影響。^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如何批判傳統史學對中國歷史的解釋，並且在打破舊的解釋的基礎上重建新的歷史觀，是中國歷史學家關切的重點。在這一意義上，康有為的疑古和“托古改制”，是中國近代科學史學的一個源頭。

所謂科學史學，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對史料進行謹慎的批判，力求寫出所謂的“信史”，成為“客觀的”或“批判的”史學；二是對歷史的演變作一解釋，尋求一種規律性的東西。康有為的疑古精神，打破了人們對故紙堆的迷信，有助於所謂“批判史學”的建立。這一“批判史學”，在西方以蘭克學派為主要代表。而在中國，則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歷史研究為典型。但是，康有為對科學史學還有另一種貢獻，那就是他提出和倡導的進化論歷史觀。易言之，康有為通過托古和疑古，提出了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種規律性的解釋。

由於康有為執意要將這一歷史觀視為是中國固有的東西，因此他對歷史進化論的描述，帶有濃烈的冬烘氣。譬如，他一定要說孔子的所謂“三世說”，在《春秋》中曖昧不明，但在《禮運注》中才作了較詳細的說明。因此只有通過對照兩書，才會得到真正的理解。而康有為本人，正是如此這般地發現了孔子的微言大意。由此，康有為將公羊三世說與《禮運》之“大同小康之道”加以聯繫，提出了據亂、昇平、太平的歷史解說，並以“小康”對“昇平”，“大同”對“太平”，把歷史看成一個

循序漸進的演化過程。他的著名的《大同書》，正是這一進化論歷史哲學的必然歸宿和理論升華。

因此，康有為對中國的科學史學，有奠基之功。他既表現了強烈的懷疑、批判精神，又提出了系統的歷史解釋。如果說他的疑古思想，還能在前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影子，但他對公羊三世說的改造，并用此來宣揚歷史進化論，則是他自己的一大發明。以後中國的科學史學，正是在這兩個方面同時開展，在不同的階段互有消長、互有補充，演化成一種多姿多彩的局面。

康有為的疑古思想使人不再受縛於傳統，因而為科學史學的進入中國鋪平了道路，但在起初，科學史學之主要吸引力，不在其治史的方法，而在其歷史的進化論解釋。梁啟超的《新史學》，便是闡述歷史進化觀的系統著作。在梁眼裡，他的史學之“新”，正是由於他掌握了這種新的歷史解釋理論。這從他寫作《新史學》的順序可以看出。《新史學》的首篇是梁對舊史的批判。在其中他指出了中國傳統史學，主要是作為正史的這一傳統的主要缺陷，認為這一史學編撰的傳統有“四弊”和“二病”。這“四弊”主要指的是中國史家治史的狹隘，而他在談論“二病”的時候，則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史家缺乏解釋歷史的意圖，所謂“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都是同樣的意思。因此可以這樣說，在梁啟超眼裡，中國史學傳統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史觀陳陳相因，沒有對過去作出不同的、新的解釋。^⑦

在《新史學》的第二篇裡，梁啟超開始闡述他的“新”歷史觀，所謂“史學之界說”。在他提出的三條“界說”中，都有“進

化”二字。“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這裡的歷史，是所有歷史——包括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總和。然後，他又將範圍縮小，限制在人類史的範圍，但基本界定仍然未變：“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顯然，在梁的眼裡，進化論是歷史演變的不二法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他還要對此加以強調：“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等於是說，雖然人們已經知道進化論是歷史演變的公理，但作為歷史學家，還是必須以闡述這一進化現象為研究寫作的主要任務。梁之服膺進化論，可謂達到了極致。

值得注意的是，與康有為不同，梁啟超并不想托古創新，借助古人來申揚新說。因此他只是在行文中間簡略地提到了“三世說”，然後輕描淡寫地指出了孟子循環論史觀的錯誤，認為只是眼光不靈，為歷史現象的螺旋發展所迷惑，没能看清歷史進化的真相。他寫道：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孟子此言蓋為螺旋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⑧

在梁的筆下，孟子這位中國的“亞聖”幾乎成了歷史的初學者，有待於歷史觀的新啟蒙。梁啟超對孟子以及“三世說”的評論，承襲了其老師康有為的學說，但他對前人，則顯出更大的不恭。這種不恭，自然是奠基在康有為疑古思想的基礎之上的。梁不像康那樣，在引進西方歷史觀念時羞羞答答，還要假

托古人來為其開路。他寫作《新史學》，間接直接地模仿和採用了西方的模式。雖然他自己不通西文，但他在流亡日本期間，閱讀了不少日本學者（主要是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的有關著作，並且馬上搬來，闡發新的歷史觀念。^⑨

因此，梁啟超所描述的科學史學，儘管來自二手的材料，通過了日本人的轉譯，但與康有為相比，又可以說是一手的，因為梁無意假借古人之著作來闡述新的歷史觀念，而是採用了一種“拿來主義”，直接從外國將科學史學引進中國。於是，在梁啟超那裡，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過去與現在開始形成了一種對立。這種二元對立，雖然有簡單化之流弊，但卻使得當時的人較為徹底地擺脫了傳統的束縛，認識到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因而更為大膽地用現在的眼光看待過去、解釋過去，為歷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新發展開闢了道路。^⑩

二、科學史學與民族主義

梁啟超所提倡的科學史學，特別是他所欣賞和極力推崇的歷史進化論，在西方的產生自有其社會文化淵源，是十九世紀西方哲學思想的產物。這一歷史觀念，可以用“歷史主義”(Historismus, historicism)，或者“大寫歷史”(History)這些術語來表達。它的主要特徵有三：一是把世界上所有地區的歷史視為一個統一的過程，共同遵守同一個時間參照系統，於是，各地區的歷史演化便顯出了時間上、速度上的先後；二是認為歷史的演化必然會向前發展，遵循一個進化的過程；三是採取

一種尋根論(teleology)的觀點來看待過去與現在的關係,認為現在是過去各個階段歷史發展的結果和產物,因此過去能够說明現在。歷史研究就是為此目的。

這三個特徵,相互依存,無法或缺其一。倘若沒有同一的時間觀念,歷史進化的快慢就無法看出,而如果不將過去與現在的關係用一種目的論的方式表達,即不把過去看作是現在的鋪墊,那麼歷史的進化現象也就無法明確表達出來。這一歷史觀念,體現了西方國家在工業化相繼完成之後所表露出一種自得自滿的心理,認為西方不僅領先於全世界,而且其歷史演化也是一個意義深遠的過程,將成為其他各個地區效仿的榜樣。^①

那麼,為什麼這一西方的歷史觀念會對中國史家產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西方工業化的完成,不僅改造了西方社會,而且也改變了西方的軍事裝備,使其軍隊(包括海軍)成為當時世界上稱得上無戰不克的常勝軍。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就讓中國人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以後中國的多次失利,更讓人覺得世界局勢之革命性的變化。為了讓中國也像日本那樣迅速跟上變化了的世界,中國的開明思想家提出了變革的計劃。對康有為、梁啟超來說,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不僅說明了西方之所以先進的現象,而且也成為他們用來說服國人、倡導改革之必要的有效武器。毋庸贅言,他們提倡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中國的再度富強。因此,歷史進化論對他們來說,既解釋了世界局勢的變遷和西方的興起,也是他們宣揚民族主義思想、希望民富國強的理論基礎。

在梁啟超《新史學》的起始,他開宗明義,交待了他提倡

“史學革命”的民族主義目的：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且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②

梁啟超的確是文章高手。他這一問題，不由得讓讀者深思中國史學傳統的缺陷，因此他之提倡“史學革命”，便有了前提。而這一前提，正是史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從理論上看，歷史進化的觀念，對梁啟超等人提倡民族主義思想和史學，有不少幫助。正因為有同一的時間觀念，各個地區的歷史都被排在一條進化發展的綫上，中國的落後就凸顯出來，成為不容爭辯的事實。而目的論的分析方式，則讓人看到，中國之所以落後，正是由於過去的歷史所造成的。因此，中國目前的危機，必須在過去中去尋找。正如西方的先進，必須通過其歷史才能得到解釋。“史學革命”便成為勢所必然、呼之即出。

正如上面所言，梁啟超之提倡“新史學”，是那時史學界的一種風氣。如鄧實在1902年8月的《政藝通報》上發表了“史學通論”一文，指出“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鄧像梁啟超一樣，認為歷史著述與民族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也即民族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正如馬敘倫在當時所說，中國的興起，必須仰賴於史學觀念的

更新，已經是那時許多人的共識。^⑬

這一史學革新運動，既有來自上層，像梁啟超等政治改革家的推動，也反映了社會的需要。由於新式學堂的開辦，原來的史書由於卷帙浩繁，不再適用，必須加以整理。因此便有人將其縮編。但更為簡易的辦法則是翻譯和編譯日本歷史學家寫作的中國史和外國史的著作，並且在其基礎之上寫作新式的歷史課本。譬如，在梁啟超《新史學》連載於《新民叢報》的同一年——1902年，文明書局出版了丁寶書、陳懋治的《中國歷史》和秦瑞玠的《西洋歷史》和《東洋歷史》。稍後，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莊俞、姚祖晉的《歷史》和姚祖義的《最新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些教科書，從章節編排到題目的設定，都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影響。其實，諸如“東洋”和“西洋”等名稱，也是由日本人所首先發明使用的。^⑭

中國人對日本學者所著史書的重視，自然是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學生的留日熱潮有關的。在二十世紀以前，一些日本學者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了中文。比如受到梁啟超好評的日本桑原鷺藏的《東洋史要》，在很早就被譯成了中文，成為以後陳慶年寫作《中國歷史教科書》（1903年初版）的主要依據。而柳詒徵寫作的《歷代史略》（1903年版），也主要根據另一日本學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寫就。^⑮

由此看來，曾鯤化、夏曾佑、劉師培等人在1903年至1906年間相繼出版的、以進化觀念寫成的中國歷史著作，也是事出有源，並非無本之木。在以往研究他們的論著中，比較強調他們所採用的章節體寫作體裁，認為是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大突破。^⑯自然，能够採用新的史學體裁，的確是史學史上的一件重

要的事。但是,在當時人看來,他們的所謂“突破”,並沒有“驚天動地”的效果,因為在翻譯過來的日本學者的歷史著作中,章節體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中國現代學者推崇他們,特別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史》),無非是因為作者是中國人而已。這裡也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⑦

其實,使用章節體只是一種形式,更重要的問題是作者的見識。夏曾佑等人之所以為人所賞識,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採用了進化論的理論。梁啟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夏曾佑的歷史研究。但他的著重點則在其歷史解釋,所謂“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而不在其所採用的章節體。^⑧易言之,梁啟超等人雖然倡導和引入了進化論的歷史觀,但夏曾佑等人則用進化論觀點解釋了中國歷史。

夏曾佑、曾鯤化和劉師培等人的書幾乎同時出版,但比較起來,夏著的進化論觀點最為明顯。曾著視野遼闊,幾乎包羅萬象,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力作,不再局限與宮廷王室的活動。劉著也有相似的目的,但更注意社會與經濟生活。而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則開宗明義,倡導一種新的歷史觀念,用進化的觀點劃分中國歷史演化進步的階段。

夏曾佑指出,中國歷史可分為三大時期:自傳說時代至周初,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而自宋至現在,為近古之世。每一世,又可分為兩個或三個時期,以此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亂世”,如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等分裂時代。但每次衰落期過後,總有一個復盛或更化時期,如唐代和清